

# 民间信仰与“革命传说”

## ——从求雨、变天、神水神药看共和国成立初期民众 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丸田孝志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村大力推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社会改造也进行地如火如荼。但是农民将各路神仙作为信仰对象以求得现世利益的多神教心态以及行为模式仍在延续。通过中共的政治运动民众增强了自己的“权利意识”，开始想要将各种迷信正当化。在当时稳定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与社会环境均不完善，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民生领域也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对迷信所采取的严厉的压制政策反而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朝鲜战争爆发后，当美军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的消息一经传播，民众便开始成群结队拥往各种山川、古迹寻求神水神药，这些迷信行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盛行。可以认为，这些骚乱发生的原因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对于战时动员而负担增加的不满，以及不安定的社会状况等问题有关。

但是，同时从这些骚乱之中也能够经常发现，民众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政府权威将迷信行为正当化的情况。民众的这些求雨、求取神水神药的行为是自发的，目的在于安身保命，并非全都是反政府的。接受了中

---

\* 本文将丸田孝志《民间信仰と“革命の传说”——祈雨、变天、神水·神药を巡る建国初期中国の民众と权力》，笹川裕史编《战时秩序に巣喰う“声”——日中戦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与中国社会》，东京：创土社，2017年，概括而成的。

共的阶级教育,对自己应得的“权利”意识有所觉醒的民众希望政府能够行使自己的“天职”,改掉对信仰的不信之心,敬天畏神,广施恩德于天下。从此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民间信仰极不稳定又充满变数,权力如果应对得当,是可以将民间信仰引入自我体制之内并为我所用的。政权已经意识到了民间信仰对于权力的这种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由革命领袖、红军以及与其相关的事物所引发的奇迹而编成的“革命传说”。这个过程也是,与民间信仰如影随形的权力,在新的历史阶段,想要独占意识形态规范的再建过程。但是,与权力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社会有志为“万民”谋求更为彻底的幸福。下层民众通过已经迸发的“主权者意识”,开始在全国各地要求信仰自由。这种状况也只有中共权力之下才真正成为了现实。

## 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村大力推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社会改造也进行地如火如荼。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稳定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与社会环境均不完善,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民生领域也十分脆弱。在如此状况之下,一直以来将各路神仙作为信仰以求得现世利益的农民们的思想以及行为模式得以延续,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以及政府所采取的消除迷信的政策反而招致了民众的激烈反抗。有关于这一时期民众的集体性宗教信仰活动的研究,很多都是以镇压反革命的视角对“反动会道门”所采取的措施而进行的描述。近年来,以社会史学的方式,从全新的视角而进行的研究进展不断成果颇丰。

李若建等人着眼于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社会经济不平衡状况以及集体记忆的地域特性,对求雨、向各种寺庙·圣迹·山川求取神水神药所引发的民众的群体行为、各种流言以及各种群体事件发生的背景进行研究,指出:权力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阶级敌人策反的说法以及所使用的政治手法上都有所欠妥<sup>1</sup>。但是,在神水神药骚乱的问题

上,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对战时体制进行了调整,这一变化对当时民众的群体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上述研究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杨念群利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等资料进行研究,指出了反细菌战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以及神水神药骚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杨念群所关心的是: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卫生运动向民众灌输卫生观念并进行社会改造的,并没有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来解读当时的权力与社会关系<sup>2</sup>。Steven·A·Smith指出,民众在神水神药事件中的行为未必全都是对权力的反抗,民众想通过权力的话语方式来寻求民间信仰的正当化。这和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众神化毛泽东的手法如出一辙<sup>3</sup>。但是,上述研究没有充分对权力与民间信仰的历史关联性以及民间信仰的机制进行讨论。此外,这些群体行为所反映的民众的信仰和愿望,为在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的部分革命故事(本文将其中与中共领袖以及红军有关的事迹所引起的奇迹故事称之为“革命传说”)所吸收,这无疑是研究这一时期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关系的良好素材,但目前为止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仍然有所欠缺。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吴毅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调查发现,由于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借助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了合理解释,并将新的文化式样与传统习俗进行了巧妙结合,因而为农民们所接受<sup>4</sup>。祁建民通过对华北地区国家

- 
- 1 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李若建《谣言的建构:“毛人水怪”谣言再分析》《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李若建《习俗成谣:“仙水神药”事件的建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4号,2014年。
  - 2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 3 Smith, S. A., “Local Cadres Confront the Supernatural: The Politics works of Holy Water (Shenshui) in the PRC,194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188, 2006.

与村落之间权力关系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华北地区村落之中的民间信仰由于缺乏组织性而无法对抗国家权力,但以共通信念为基础的信仰长久以来有效地约束着村民们的行为。因此祁建民认为,正是由于组织的宽松性从而使得信仰得以长久保留<sup>5</sup>。这些研究都指出,民间信仰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共和国初期各种因民间信仰而引发的群体性行为上都能得以确认,这对考察这一时期权力与信仰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是大有裨益的。

日本学者佐藤公彦认为,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汉代以来皇帝掌握皇权与神权的“政教合一”模式的延续,宗教非但不具有独立性,反而完全被同化进了政治之内。在现代中国,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取代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政权的正统思想。即便如此,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宇宙观·人生观中所展现的融合主义倾向依然在民间信仰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sup>6</sup>。但是我们不仅要从佐藤的讨论中了解中国历代政权统管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及其机制,而是也要对权力与社会之间互相产生作用的机制进行解读。民间信仰充分体现了其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生存方式,在权力独占意识形态的状况之下,民间信仰顺势而为并得以生存。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意在对共和国成立初期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具体而言,就是对民间的求雨活动、有关天灾和“变天”(政权更迭)的流言、神水神药骚乱以及革命传说为考察对象,着眼于权力与民间信仰在保持原有关系的的同时的演进过程,将就民

---

4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第145-156页。  
5 祁建民《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结合と国家权力——近现代华北农村的政治社会构造》,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6年。  
6 佐藤公彦《中国近现代史はどう书かれるべきか》,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第2章、第6章、第7章。

间信仰对新生权力如何进行解释,以及两者又将建立何种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 一,天与民众

### 1. 干旱与求雨

在水利灌溉设施非常落后的时代,对有赖于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的人们而言,求雨就成了旱灾来临之际一种必然的习惯性行为。中共在推行土地改革等政策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激进行为,屡次试图通过各种运动来破除迷信,求雨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曾一直下达指示,要求基层政权在对待与民众生死攸关的各种天灾、疾病等迷信活动时要慎重。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中共在面向基层干部所发行的杂志中曾明确指出,如果对这些迷信活动进行长时间打压的话,就会引发群体性哗变。如果干部硬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则会被群众所孤立,甚至会被侮辱嘲笑。文中同时指示干部要见机行事认真对待,事先做好应对旱灾的准备,以事实来教育说服群众<sup>7</sup>。

从近代观点来看,求雨活动源于民众的无知,是有害且无意义的迷信行为,仅是强调了求雨的消极一面。但是,通过刘俊起对位于河南省泌阳和桐柏两县交界处的老刘店村的求雨活动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该村出名的求雨活动具有如下各种社会功效。①对村民而言是一种心理慰藉,②通过虔诚的祈祷以及各种象征符号的合理运用,村民相信神仙定会赐雨。在仪式过程中村民们验证了自身与这位拥有强大降雨能力的祖先神的特殊关系,从而获得了一种集体安全感。③村民们为了村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得以在一时间内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④规模宏大的求雨队伍是老刘店村实力的象征,不仅能得到他村村民的恭敬

---

7 《群众迷信求雨怎么办?》《新大众》第44期,1947年11月1日。

和追随,而且也是老刘店村村民的光荣。⑤同时也是一种休闲与娱乐的机会。村民们会通过如下方式来“验证”求雨的灵验性。①求雨有着严格的仪式以及象征符号的运用规则。如果求雨失败,就会将责任推托给没有严格执行仪式或规则。②将未来降雨的时间节点设定的较长,以提高降雨的可能性。③求雨成功的案例会成为村民们的集体记忆并口口相传下去<sup>8</sup>。如果求雨活动的基础源于上述的社会功能与信仰的话,要想取缔求雨活动,就需要对这种共同体机制进行有效参与。但是,对于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共而言,显然尚未做好这方面的充分准备。

《内部参考》的报告显示,1952年西南地区、华北五省、东北地区、西康省、湖北省以及福建省都发生了严重的干旱灾害,累计报灾23起。1953年西南地区、湖北省、青海省、广东省、甘肃省、宁夏省、江西省、华东地区、福建省、河南省、山东省也均发生了旱灾,累计报告25起,受灾规模遍及全国。

从下表可知,1951-1953年的旱情比较严重。尽管1951年的旱情非常严重,但《内部参考》中并没有找到有关求雨活动的相关报告。政务院下发《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通知》,并开展全国性抗旱活动则是在1952年2月以后。因此可以认为,在此之前,抗旱政策尚未成为政府的重要课题。根据《通知》显示,向民众普及“人定胜天”的理论再次成为了政府的一个明确课题<sup>9</sup>。

1952年春,在四川省北部地区旱情发生之际,当地农民之间“靠天吃饭”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有农民表示:“毛主席的政策啥子都好,就是与天作斗争要不得”。普通农民对“与天旱作斗争”、“与天作斗争”的口号非常不满,认为越斗才越不下雨(《内部参考》1952年4月19日。

---

8 刘俊起《老刘店:一个求雨“神话”的建构》《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9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决定的通知”》(1952年2月8日)《中国农报》,1952年第4期,第8-9页。

以下以 NC52.4.19 的形式略记)。南部县双河乡的会道门信徒们则抬着菩萨求雨,反对建水利设施(NC52.6.5)。四川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遭受了比较广泛的雹灾,四川省东部地区的干部竟说是“把老天得罪了”。“不靠天不靠神,雪弹子(冰雹)打死人”,“斗争天吗,天整死你”等流言四起。涪陵专区的部分农民则点香立蜡烧纸乞求神灵保护,有的干部则埋怨认为旱灾本就不该抵抗(NC52.5.2)。

1953 年出现了有关因民众求雨活动而引发的暴力事件的报告。四川省江津专区 6 月到 7 月的一个月期间的报告显示,各地出现民众趁求雨活动闯进乡镇府,共发生 11 起捆绑殴打干部的现象(NC53.7.29)。在浙江省金华专区,也出现了因区委书记阻止求雨活动而被捆绑殴打的现象,同时,还发生了包围乡政府殴打民兵的事件(NC53.8.11)。

到义和团战争爆发之前,设坛祈雨是地方官或皇帝的专属的礼法之一<sup>10</sup>。在民众看来,权力本就应该以民为本,为民祭天消灾。因此,在福建省福安专区,“×× 县长不信神,所以天不下雨,×× 县长信神,已经下雨了”等流言四起(NC53.8.3)。此外,上述江津专区发生的事件中,有人打出了“请雨是为国为民,为了抗美援朝”的口号,认为求雨就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

表 1  
共和国成立初期干旱受灾、成灾面积

(万亩)

年	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1950	3,597	884
1951	11,744	3,449
1952	6,354	3,818
1953	12,924	2,012
1954	4,482	840
1955	20,119	6,036
1956	4,691	3,077
1957	25,807	11,100
1958	33,541	7,546

\* 成灾面积指的是:农作物的实际收获量比往年减产三成以上的面积。

根据高文学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地震出版社,1997年,第 389 页制作。

10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 133-135 页,柯文(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62-63 页。



民众对于长久以来已经习以为常的,旧的皇权时代的权力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以“人民政权”自居的中共政权之下,民众作为社会主人翁的意识开始逐渐提高。国共内战期间,在太行根据地,有教员利用黑板报对民众的求雨活动进行了批评。为此,民众对该教员进行了反批判,认为“这是不走群众路线!”,神看见了黑板报“又使气走了!那今年我们的生活就非找你刘教员负责不行!”<sup>11</sup>。1952年在四川省武胜县某乡,干部在宣传破除“反对靠天吃饭的思想”时,有个农民反驳说“你们当然不靠天,你们是靠我们吃饭嘛”(NC52.4.19)。由此可知,中共所推行的“到底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非常彻底,已经为一部分农民所完全接受,对于干部也是由农民所供养的这一事实已然觉悟。

一部分民众在仍然保持自己的生命由天而成的自然观和“天”的思想的同时,自发行动要求政府和干部组织求雨活动。1953年甘肃省庆阳专区出现严重旱情,累计有13万人受灾,其中在定西有三千多人来到地区专员公署,要求专员率众求雨(NC53.6.22)。在浙江省金华专区,民众涌入乡政府,要求乡长向神明叩头三小时,并要求政府迎佛,还要使用民兵的枪支鸣枪“震天”,致使干部和民众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NC53.8.11)。在丽水,三百多农民要求县长拜菩萨,有的区甚至发生了押着区长、乡干部,逼迫他们拜神的事件(NC53.8.3)。在青海省湟源地区,由于民众的求雨仪式遭到了小学生的阻碍,为此,怒不可遏的民众冲进县政府对干部进行殴打,并提出要民主选举县长的要求<sup>12</sup>。对于民众而言,权力只有遵从民众的意愿,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类似的民众自我主张并非仅限于求雨活动。在国共内战期间的根据地,在打倒村干部,将权力交给贫雇农等激进政策实施之时,有农民表

---

11 《群众迷信求雨怎么办?》《新大众》第44期,1947年11月1日。

12 李若建《民间宗教的挽歌:1950年代初的“水风波”》《二十一世纪》第121号,2010年,第115页。



示,“现在正在实行民主,区长县长也不能阻止民众敬神”(《新华日报》(太岳版)1948年6月23日)。有些农民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将迷信正当化,从而导致将干部卷入其中,致使迷信流行的状况<sup>13</sup>。革命在破除旧秩序“解放”人民大众之后,与政权一方的想法大相径庭的民众的自我主张开始在部分地区以极端的形式出现。1953年的报告显示,湖南省部分县的农民“极端的民主思想比较严重”,很多农民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干部和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只能听农民的话”,在很多地区出现农民不听从教导,辱骂或批斗干部的现象(NC53.8.21)。这一时期,各地都出现了农村干部使用强硬手段打压迷信的事例,民众的自我主张虽然强烈,但未必都能行得通。在民众采取直接的过激行为的背后,部分原因应该出自党组织向基层渗透不完全的问题上。

1955年以后,超过1953年之前数倍规模的旱灾不断发生(表1),但是《内部参考》中有关于求雨活动的报告却主要集中在1952、53年,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报告。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教育的普及以及破除迷信已不再是重点工作,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使得粮食增产的压力一时得以缓解等都有可能是原因之一。此外李若建认为,农业集体化的推进的同时,对粮食生产及其流通领域加强了控制,使农民淡薄了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因此求雨活动才得以减少<sup>14</sup>。果真如此的话,可以说基层社会的改造给民众的信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 2. 天与权力、道德秩序

天与现世的道德秩序是紧密相连的,对民众而言,敬天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对传统秩序的肯定意味着,这种天的认识与革命规范之

---

13 丸田孝志《革命の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と民俗——》,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第229-230页。

14 李若建《民间宗教的挽歌:1950年代初的“水风波”》《二十一世纪》,2010年,第116页。

间将一直孕育矛盾。在福建省,有“地主”、“坏分子”造谣称水灾发生是因为人们“道德败坏”,并散布“天有眼,人不报天报”,“贫雇农有福气,分了土地遭水灾”,“第二次大水快来了,要比这次高二丈”等各种谣言,以此来动摇民心破坏土改。德化县城内居民为此请来道士祈愿,黄山口村的村民则搬到山上躲避水灾(NC52.9.5)。

在中国自古以来天灾被视为是天谴,是对当政者失政的警告,有些人利用灾害造成的民心不稳的状况,不断制造对政府不满的言行。1950年10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的3年多时间里,约有71万2千余人被处决,129万余人被拘捕,由于设定的目标人数过多从而导致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sup>15</sup>,于是就有人趁天灾批判政府。1951年春,湖南省降雨不断,导致长沙等地约30%-50%的秧种被冲洗或霉烂,“特务”于是趁机播撒传单称,“共产党好,就是天不好”,“政府杀人过多,天老爷为了洗雪死尸,所以天不清”。个别农民埋怨政府,并对干部讲“最好请政府禁屠,不再杀人,把应杀人留到六月再杀,那时多下雨洗尸,对老百姓还有好处”(NC51.5.12)。

还有很多流言将重大天灾认为是天谴,是中共政权将要垮台的先兆。这半个世纪以来,各种灾害以及战乱连年不断,“天”的脸色的确是变幻不定。对民众而言,根据以往经验,“变天”是经过检验的概率相当高的事实。

1953年4月以后,山西省运城专区连续遭虫、冻、风、雹、旱灾之后,“反革命分子和封建会道门乘群众情绪动荡之际正进行破坏活动”。为了对互助合作运动因推进过猛以及婚姻法的实施不彻底等所引发的问题进行嘲讽,“共产党不行了,天不容了”(NC53.5.16)等流言在十几个县四起。1955年浙江省发生了水灾,汤溪等地甚至有人开始传唱“天不信共产党,人不顺毛主席”(NC55.7.6)的歌曲。

---

15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各种会道门也趁机利用国共内战到 50 年代初的各种社会混乱,宣扬“末劫”、“变天”等思想,趁机将加入会道门寻求保佑的人们组织起来以扩大会道门势力。据统计,1950 年北京海淀区的一贯道门徒有 14 万 3 千人,到天津解放前夕则扩大到约有 20 万人<sup>16</sup>。河南郑州专区下辖的 16 个县中,在共和国成立前其总人口的约 7 成共计 19 万人加入了各种会道门(NC53.7.24)。1949 年 9 月前后,在整个东北地区仅一贯道门徒就有 50 余万人,其他各种会道门组织等也共计多达 60 余万人<sup>17</sup>。中共在内战期间也曾仿照会道门盟誓的手法扩大组织力量,这又助长了“变天”思想的蔓延<sup>18</sup>。即使到了 1952 年末,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哈喇会仍然在宣称“青阳世界(国民党)已完蛋,红阳世界(共产党)已三年,白阳世界(哈喇会)正当夺取天下之时”,通过白莲教三期三佛掌教说中的末世论解释国共两党与会道门之间的权力交替,并组织了暴动(NC53.1.23)。这些都说明“变天”思想在民众中间仍然根深蒂固。

### 3. 天与毛泽东的权威

自称人民权力,以破除“封建迷信”为口号不断向基层农村渗透的毛泽东的权威,是如何与“天”的思想发生关系并进行定位的呢?

从抗日战争末期开始,中共就开始向大众灌输“毛泽东是真命天子”的意识,民众在生活中也确实将灶神、土地神的神像替换成了毛泽东像<sup>19</sup>。中国的民间信仰原本就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近代以来又逐渐消化吸收了部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要素,展现了其灵活包容的特点。同样,中共要神化毛泽东,将其塑造造成绝对权威的意图是比较成功的,上述

---

16 李若建前引书,第 104-105 页。

17 《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处理一贯道等封建会门的报告》(1949 年 9 月 20 日)《公安通讯》1949 年第 8 期,第 1 页。

18 丸田前引书,第 8 章。

19 丸田前引书,第 5 章。

将灶神等替换成毛泽东像就说明,毛泽东已然化身为了保护他们现世利益的神。根据1950年1、2月份河南省安阳专署公安处的报告显示,有宗教结社活动就是利用了“末劫”、“变天”思想在组织人员。同时也表明,这些活动在保持原有宗教要素的情况下,吸纳了部分基督教甚至共产主义思想,再次展现了民间信仰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在该专区自称基督教的宣教结社活动中有流言散布称,到了春季,国民党将会在美国的援助下用飞机播撒毒药,并运来部队将共产党员与干部统统杀光。同时还宣称,“开天地辟迄今六千年,四千年前洪水伐世一次为禹王治好了,现在已快到火伐世界了,到那时人死大半,一切东西皆属一空,只有耶稣才能避免”。此外,还有类似“斯大林是基督教的总头子”,“共产党的政策和耶稣教一样,共产党还是跟耶稣学的哩”,“耶稣是工人出身,毛主席是为工人办事的。所以说共产党和耶稣教一样,不同点仅是共产党有批评检查,而耶稣教没有”等言论出现。为此,有个农民在家里将毛泽东像与耶稣像同时张贴<sup>20</sup>。

在宣扬中共政权将要遭受“末劫”而崩溃的同时,却又借助共产党的权威将教义正当化。为了使宣传内容便于为民众所欣然接受,于是将禹王治水、诺亚方舟传说以及部分浅显易懂的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混杂,将能利用的东西全部利用,充分说明这完全就是一种迎合主义。这些看起来具有反动性质的结社活动,不论其如何蠢动,随着社会的日趋稳定,其结果必将是向中共政权靠拢,跟广大民众一起提高中共的威望。但是,对于意图通过权力来独占正统意识形态,并将正统意识形态向社会整体进行贯彻的中共政权而言,各种结社活动不论通过各种“奇谈妙论”来提高自己的威望,这终将是不会被允许的。

上述有关浙江省金华专区求雨的报告中显示,在东阳县郭宅出现了模仿将龙神像曝晒在太阳底下进行求雨的仪式,将毛泽东像也进行曝晒

---

20 《安阳专署公安处公一、二月份综合报告》《公安通讯》1950年第3期,第5页。

的现象(NC53.8.11)。这说明民众将毛泽东认为是掌管天气的神,将毛泽东和那些在日常生活各方面护佑人们现世利益的神一视同仁。

1952年春,河南省临颖县东王乡疫病流行之际,有“地主”放言称这是因为毛主席眼睛大的原因。受此影响,出现了民众将毛泽东像的眼鼻开孔,或用刀割划像或将像扔进牛棚的现象(NC52.5.6)。民间原本有将不会给民众带来幸福的神像进行损毁的习俗,从对破坏毛泽东像一事来看,毛泽东信仰可能的确曾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有所灵验。在四川省巴县一品乡七田村,有“坏分子”利用求雨主张“要毛主席搬走,以安菩萨,免遭大劫”,以达到其“修菩萨”以及让小学搬迁他处的目的(NC53.7.29)。在日本,神社是祖先信仰与地域信仰的有机结合,是神灵稳固的归就之所,不具备日本神社这种牢不可破地位的毛泽东的权威说明,当时政情不稳,其绝对权威尚未确立<sup>21</sup>。

另外,新的当权者的权威只要还是需要运用“真命天子”的概念来进行解说的话,不论毛泽东的权威如何之高,对于多数民众而言,现世的当权者仍然是处于“天”之下的,即便毛泽东也无法免俗。对于持有天命思想的民众而言,“人定胜天”只不过是谦逊言行的一种,忤逆老天的“伟大领袖”也根本就是矛盾而不可能存在的。1953年在四川省綦江所引发的求雨骚乱中曾有流言称,“毛主席只有二十五年天下,不信神,八十个大天(干旱),四十个红雨(雹)”。1955年浙江发生水灾时也有流言称“毛主席不要迷信,这次大龙来了,不要他了”,预言不信神的中共政权必将倒台(NC53.7.29, 55.7.6)。1952年在修缮某个西安有名的道观时,有人说,“在朝鲜和台湾两交界处,坐有一个老人,劝告毛主席说:“你若能够

---

21 有关日本村落信仰的构造研究参考了如下书目等。平野义太郎《北支村落の基础要素としての宗族及び村庙》,平野义太郎·戒能通孝·川野重任共编《支那农村惯行调查报告书》第一辑,东京:东亚研究所,1943年,丸田孝志《灶神と毛泽东像——战争·大众动员·民间信仰》,水羽信男编《アジアから考える——日本人がアジアの世紀を生きるために》,东京:有志舎,2017年,第202页。

信神,江山才能永保””,因此毛主席才投入巨资修复寺庙(NC52.11.17)。这种认识表明,即便毛泽东也是在神明的庇佑之下才坐得江山。

上述山西省运城专区因天灾而引发混乱之际,一个名为“一心天道龙华会”的会道门组织宣称,他们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是因为“取得毛主席的同意”(NC53.5.16)。如后所述,民众宣称他们的信仰活动是得到了国家以及领导人的支持等这样的言行,并不是说所有的信仰活动其目的都是对政权的反对。但是,这些游离于党和国家统制之外的活动迷信色彩浓重,并以穷困百姓作为拉拢对象而进行组织扩张,这对执政当局而言是值得警惕的。将自然灾害的发生认为是“变天”的前兆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早已被完全渗透进基层社会,因此这种危机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 二,神水神药骚乱与权力

### 1.“细菌战”与神水神药骚乱

1952年3月,外交部长周恩来公开发表声明称,在朝鲜战场与志愿军对峙的美军对中国东北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人民日报》1952年3月8日。以下以RR52.3.8的形式略记)。于是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对于疫病的发生而引发的恐慌,民众开始成群结队拥往各种山川、古迹寻求神水神药。

李若建表示,向山川、古迹寻求神水神药的民间治病方式自古有之,是以对神仙、义人、孝子的民间信仰为基础而发生的个别行为,这种有规模的群众行为易于在瘟疫或青黄不接时发生。有些疾病是自愈的,有些疾病是由于得到了某种心理安慰而治愈的,有些腹痛病是因为服用了香灰草木灰中所含有的钾元素而痊愈的,对于那些无法通过正常的医疗手段来治疗疾病的民众而言,神水神药就是他们得以依赖的治疗手段。对于包括会道门在内的一些从事民间信仰活动的个人或团体而言,神水神药就是他们获取收入以及扩大影响力的好机会,甚至当地的一些民众也

会为获取钱财而趁机而入,这助长了骚乱的扩大化<sup>22</sup>。

在内战时期的中共根据地,也是因为一些政策的实施过于激进化,从而导致混乱发生,并且在疫病流行之际,由于村中的各种神灵已经被禁止,于是人们就开始面向村外到各种山川、洞窟、古迹等寻求神水神药<sup>23</sup>。1952年发生的神水神药骚乱有几个新的性质特点值得注意,其一便是与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有关,其二是与对外战争以及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相关,从而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其三是随着近代医疗的普及,权力具有破除迷信的强大意志与能力,对这种民众自发的行动能够进行积极地干预。

《内部参考》的报告显示,在5月之前美国军机已经在东北以及华北各地、江西、浙江、湖、湖南、广东、广西各省的广大地区播撒了细菌病毒(NC52.4.24, 5.10)。6月之前东北地区每月的感染人数为数百人,之后激增到28,100人(NC52.8.7)。《人民日报》、《东北日报》连日报道了各地的受害以及各地批判细菌战的情况。同时还刊登照片,揭示了美军空投的细菌弹、细菌的形态以及昆虫的样子(RR52.3.15、《东北日报》1952年3月18日,25日等)。但是,《内部参考》中曾有报告显示,美军空投的肥皂、玩具、传单也都被认为是细菌武器(NC52.5.10),这有可能夸大了受害状况。《人民日报》上除了朝鲜、中国东北以及青岛(RR52.3.15, 5.25)之外的地区,并没有遭受细菌战的报道出现。因此,这表明当局虽然是掌握各地的“受害”状况的,但未就此做出结论。

在东北地区,有人对细菌战毫不介意,说“二月二龙抬头,虫子都出来了,什么毒不毒?”。但是也有人反应过激,虽然仅是被蚊虫叮咬却跑到派出所报案。此外还有人认为这是要“变天”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兆而惶恐不可终日,民众的表现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内

---

22 前引李若建《习俗成谣：“仙水神药”事件的建构研究》。

23 丸田前引书,第183-184页。



部参考》认为,这些流言与旧国民党军官、“反革命分子”以及“封建会道门分子”有很大干系。《内部参考》还指出,敌对分子一方面在各地煽动民众对细菌战产生恐慌的同时,认为中共披露“细菌战”的信息是为了让全世界人民憎恨美国,也是将医护人员送往前线的借口(NC52.3.24)。从这些相互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对“细菌战”的应对是很混乱的。

事不凑巧,此时各地又开始流行起了各种季节性疫病,3月中旬到4月上旬,山东省有31,014人出现麻疹,其中1,399人死亡(NC52.5.3)。4月前后,四川省东部和南部地区在遭受旱灾的同时,3万余人得了疫病,其中4千余人死亡(NC52.4.24)。新闻媒体对“细菌战”的受害情况不断进行连续报道,各地也举行了各种反“细菌战”的宣传和运动。但是,各地仍流言四起,认为疫病就是“细菌战”,这无疑使事情变得更加混乱。

去年4月卫生部曾召开全国防疫会议并制定了今后防疫工作的方针,既: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化对民众的宣传与教育,使民众自觉自发地参加防疫运动<sup>24</sup>。可以推测的是,这一时期当局实施的一系列有关“细菌战”的宣传与行动的目的的重点在于提高民众对“细菌战”的警戒性,有效实施战时动员的同时开展防疫运动。李若建认为,共和国成立初期神水神药骚乱出现的第一个高潮在1953年,此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社会统制业已趋缓,这反倒成为了骚动扩大的动因<sup>25</sup>。但是,经过对《内部参考》的仔细查阅发现,从1952年开始,神水神药骚乱就已经在以华北、西北地区为中心的至少8省30余县发生,并呈现向全国蔓延之势<sup>26</sup>。由此可以认为,其直接原因便是当局所披露的“细菌战”信息而引发的民众恐慌,以及反“细菌战”运动的大力开展的结果。

---

24 肖爱树《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论述》《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0卷第1期,2003年,第97页。

25 李若建前引书,第151-152页。

26 李若建前引书,第122页,NC52.5.6,6.16。

在河南省许昌专区出现的神水神药骚乱被认为是“残余土匪特务”为了欺骗和蛊惑民众,将一般性流行性疫病谣传为美国播撒细菌的结果。其中在 9 个县出现了求取神水现象,有的地方人数甚至多达数千人。舞阳县县级机关的全体干部在卫生科的统筹安排下饮用了雄黄酒并每人购买了一盒万金油(NC52.5.6)。此外,在陕西省有流言将发生的虫灾认定是细菌武器,有 10 几个县为此发生了神水骚乱。会道门则以入会得生为幌子,开始劝诱民众入会(NC52.6.16)。即便是在没有疫病发生的地区也发生了骚乱,在山东省德州专区昌南地区,有“地主”播撒掺杂了鸡毛与毒药的小米,谎称是美国军机空投的,从而引发了群众的恐慌(NC52.5.21)。

虽然各种流言不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都是针对权力的敌对行为,反倒是部分流言借助政府的权威而将迷信进行了正当化。在吉林省德惠县马架子村,由于有“地主”将村中古井里的水称为是神水,包括辽宁省以及黑龙江省在内,每天从各地有数百上千人涌来。其中也有复原军人佩戴勋章位列其中,有人说,省政府也派车运水让志愿军伤病员饮用(NC52.5.6)。此次骚乱反映了朝鲜战争伤病员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省政府也求神水来救济伤病员等说法,将迷信行为正当化了。

## 2. 1953 年的神水神药骚乱与之后的民间信仰

各地的神水神药骚乱在 1952 年夏季有所收敛,但随着 1953 年春季疫病的流行又开始死灰复燃。仅就《内部参考》而言,有关“细菌战”的流言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但为抵抗美国“细菌战”而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却依然在继续(RR53.3.28)。民众对未来朝鲜战争的走势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以及对于战时动员给自己带来的负担和对农业集体化等社会改革产生的不满情绪等等,不断对这些骚乱施加后续影响。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接近尾声、佛教各宗派被纳入体制之中以及进行宗教活动所需的内外环境的日趋稳定、寺庙修复等文化事业的开展等也对骚乱的后续以

及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西藏致敬团时表明,中共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政策将来也不会改变,《人民日报》在11月公开了此次谈话的要点(RR52.11.22)。同月,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成立,翌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sup>27</sup>。据新华社河北分社报告显示,1952年末在北京广济寺与巨赞法师会过面的河北省的二位僧人在回去后,到处宣称“毛主席检查了五大宗教的经卷(即佛教、天主教、耶稣教、回教、道教)没有障碍国家的事,所以不限制活动”。通过这一宣传,各地民众中间出现了读经以及布施热潮。但是,僧侣们的活动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流言(NC53.8.19)。

除上述例子之外,各地有流言将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寺庙修缮工作认为是毛泽东以及政府信神的根据。这说明,在国家允许范围之内开展的文化事业,与官方对于传统信仰活动的提倡被基层民众简单的混为了一谈,并在民众中间出现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神佛是灵验的。比如在安徽省,一贯道曾放出流言称,“毛主席瞎了双眼睛,请菩萨治好的,许了愿,因此现在兴修庙宇”(NC53.1.12)。在河南省,三月份开始不断有神水骚动以及各种求神治病的事件发生,每天由数十到上千人引发的神水骚动多达14起。其中很多被认为是,特务为了煽动民众从而利用了领导人或干部对待神仙的态度,甚至是神仙对干部的“报应”。比如,有流言称,“毛主席也信神,下令叫修庙,林彪不信,煮了一锅馍变成牛粪,他信神以后才变成馍”。在安阳,有在原国民党政府干过警察的人造谣称,李家村有个什么都能治的“活神仙”,“村长、区长、县长也说是个活神仙,临津县县长的老婆就是求他治好的,所以县长给他十万元钱”。这些从小生活成长于民间信仰活动的农村干部,一般都是相信这些“神力”的确是存在的(NC53.4.9)。

---

27 李刚《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经过考略》《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2卷第2期,2005年,第112页。

在太原市,党和政府对当地的“义人”进行彰显一事成为了民众寻访神药的导火索,加上当时有关朝鲜战争的各种流言的盛行,致使骚乱不断升级(以下内容引自 NC53.4.9)。

在太原市郊区西村有个傅山公祠,在 1953 年 3 月的三周左右的时间里,前后约三万民众前来寻访神药,俨然一幅开庙会般的热闹景象。不仅是山西省内,省外的石家庄、张家口等地甚至也有人前来。傅山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对清朝的统治不满,而对李自成起义表示同情。相传傅山治理汾河有功,懂得医术且不向贫苦民众收取费用,因此有关傅山的神话传说多年来一直在民间传承不息。骚乱发生的直接起因是太原市领导对于傅山义举所进行的表彰活动。前任的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韩纯德称赞傅山为爱国主义者,建议对傅山公祠进行修缮,在对有关的轶事不断进行宣扬的同时,也对遗迹、遗物进行了整理与收集工作,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傅山进行盛赞。其后任市长王大任也曾与干部们一起造访傅山公祠,并给带路的傅山后代子孙两万元,自此之后在西村以及邻村开始出现如下各种传言。

“志愿军军长挂了彩治不好,一白发老人自称是傅山,献了一包药马上就好了,于是某军长打电报叫好好照顾傅山家乡”,

“傅山在抗美援朝显了灵,志愿军被美国兵困住几天喝不上水,有一个白头发老人送来了一盆水,好多志愿军还未喝完,(中略)后来给毛主席托梦说是山西省西村傅山,因此毛主席电告太原市王市长亲自访问傅山家乡”。

《内部参考》将上述言论定性为“破坏分子、迷信分子”对民众的蛊惑,但是,权力对护佑志愿军的神仙进行嘉奖等内容则说明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对政府,反倒是要利用政府权威来将迷信正当化。另一方面,

朝廷有为嘉奖治民有方的地方官员以及彰显义人德行而对他们进行祭拜的习惯,这是一种王权利用在民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诸路神仙的权威以确立并扩大自己权威的表现。这些神仙在天灾或战乱之际,为保佑民众或王朝而显灵,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彰显<sup>28</sup>。这种基层社会与国家的相互作用,对在民间为群众所信赖的各路神灵的权威进行了有效加持。傅山是在中共政权之下被政府所正式认定过的,正统意义上的“义人”和神仙,太原市长的言行便是明证。

当民众听到“政府也承认神灵”的传闻后,为现世利益所驱动,民众就更加开始积极地求神拜佛了。根据太原市的调查显示,拥集到傅山公祠的人员之中,除了以迷信为职业以及会道门等相关人员外,八成是因为相信迷信同时抱有各种实际存在又难以解决的病患,从而前来求药治病的人。其中六成为一般劳动群众及其家人,“市民”和商人约占三成,甚至还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学生。来寻求神药者人数不仅多而且规模大,其中甚至不乏远道而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城镇居民和党政机关人员,这应该更加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

此外,其中多数为女性,约占其三分之二。在旧社会的中国,女性对于信仰活动非常积极,但是部分旧规范只允许女性在庙会或节日等特定的日期才可出门,即便是到了近代,在一些偏远农村这些旧规陈俗依旧被保留<sup>29</sup>。中共政权提倡女性解放,因此女性在信仰活动中日渐活跃<sup>30</sup>。太原市的事例说明,中共政权所推行的女性解放运动助长了女性在信仰活动中的活性化。

---

28 有关民间信仰中诸神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相互渗透的研究参考了如下书目。

滨岛敦俊《总监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年,渡边欣雄《汉民族的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东京:第一书房,1991年,泽田瑞穗《中国の民间信仰》,东京:工作舍,1982年。

29 丸田前引书,第56页。

30 丸田孝志《国共内战期,中国共产党冀鲁豫根据地的参军运动》《广岛东洋史学报》15·16号合并号,2011年。

太原市郊区政府为此在当地开展运动,对求神水一事进行批判,但是没有效果,出动公安力量进行了强行阻止反而招致了群众的反抗。在同省的灵石、离石等 60 余村中在春节过后开始出现麻疹或其他季节性疫病,为此每天有六七百人拥至各种古树、古庙、古墓之处,向狐仙或瘟神求取解药(NC53.4.9)。如上所述,在同省的运城专区 4 月以后自然灾害频发,在“变天”传言四起的同时,民众开始群体行动起来寻访各种神药。在很多县出现了“白胡子老汉献神药”的传言,这有可能是受到了傅山公祠神药骚乱的影响(NC53.5.16)。

在浙江省金华县长山乡,住在石人山附近的某个贫农在大年初一晚上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流传开来之后,向山中石碑求取仙药者开始络绎不绝(下述内容均出自 NC53.5.8)。报告的主要内容为:那个村民在梦中的石人山山道上听到有声音说,希望出五十斤稻米帮忙修建山路。事后该村民对外宣称,“石人殿老佛就被解放军和民兵打了,现在老佛搬在石人山顶上的方石里,去拜拜会保佑清吉”。第二天开始,附近的农民果真收集了五十斤稻米并连日修了路,3 月里每天前来拜佛者多达三四百人。同时,比如“全天下菩萨都到石人山开会,石人山像周围五里都是仙草、仙药、能治百病”,“毛主席只有五个奖章,老爷(菩萨)有九个奖章,穿得非常漂亮”,“汤溪县委省委书记都去拜了,公安局长、区长要拦拜佛的人,五个指头都烂掉”,“解放军几百人架了机关枪也拦不住拜佛的人”等流言不断四散开来。从神仙托梦的内容来看,和内战期间的根据地情况相同,当时被禁止在村落中祭拜神灵的民众开始转而向村外去发现神灵并乞求保佑。

4 月上旬,又出现了新的传言,说 4 月 11 日神佛转移到了别的地点。在此之前,石人山周围五里的草木泥土被传皆为神药,因此每天多达一千五到两千人前来,最多时竟有三千人之多,周边各县,甚至有人从杭州、上海等地远道而来。对于乡干部进行的反对迷信的宣传,很多民众表示,“你们人民政府干部每天有五六斤米,我们老百姓没吃没有办

法,只靠菩萨保佑,请医生医病拿不出钞票怎么办?”,干部们对此束手无策。政府虽然宣传迷信是骗人的,并且有损健康、浪费财物,但是对于那些做到无法衣食无忧且充分享受医疗的民众而言,政府的宣传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总之,不论是傅山公祠事件,还是石人山事件两者都说明,政府对神仙表示虔敬一事成为了民众的行动原理,并认为政府理所当然地支持民众为治疗疾病或寻求安定生活而发起的敬神行为。

和求雨活动一样,民众将政府保障自己生命与健康的行为才认为是“民主”,因此,民众对于权力所采取的压制政策进行反抗的状况不断发生。在湖北省随县,政府拘押了数名求取神水的民众,于是有 400 多人拥到县城向政府进行抗议,其中有人威胁干部称,“你还要压制民主?”(NC53.5.16)。

这一时期在进行社会改造的同时,对于会道门的镇压也取得了相当进展。这些结社活动曾经在基层社会中为民众的相互扶助以及安全保障发挥了其积极的社会机能,共和国成立后有些退会的下层头领以及一般会员进行了身份转换,开始在基层承担起行政机能。在河南省郑州专区 16 个县中,原基层头领的约 15%、约 17 万人会员中的 43% 的会道门成员(1 县统计资料欠缺)转变为了干部、党员、共青团员、农会会员、积极分子和民兵(NC53.7.24)。同时,不能否认的一点是,这些人有可能将民间信仰的思想和行为带入了基层政权。1959 年在河北省的原根据地发现有 38 个会道门头领自称皇帝,其中部分人是受到村党干部的保护的(NC59.4.28)。华北地区的会道门组织在一部分地区由于依附了党组织从而得以延续。

1953 年末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后,神水神药骚乱得以一时抑制。但是,1955 年到 1956 年上半年实施的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在 1957 年再次出现了一个神水神药骚乱的高潮<sup>31</sup>。1957 年 5、6 月间在广东省电白的晏宫庙又出现了神药骚动,起因是由于流感的发生,民众向



本已废弃的旧庙址拜求神药。期间,民众对农业集体化的不满为背景,在乞求神灵降临的仪式中出现了“打倒共产党”、“解散合作社”的现象,并最终发展为政治事件。据报道称,事件的首犯是原国民党政权联防的密探。事件当初,神职者们利用党的权威向大众宣称,“省委书记批准大家拜神”、“[合作]社主任、共产党员都带头拜神了([ ]为笔者加注)”,以此来招揽信众。这说明,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与对神等的信仰两个原本对立的世界在民间社会却是并存的(RR57.8.9)。

该事件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有关民间个别的神水神药等重大事件的报道出现在《人民日报》中尚属首次。当然,报道显示,该事件中敌我矛盾对立鲜明,政府采取的镇压行动果断而成功,这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民众进行消除迷信的宣传以及教育的重视。同时,事件被媒体公开报道也说明,政府当局对这类事态的掌握与处理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 三,从革命传说看民间信仰与权力的关系

#### 1. 革命故事的出现与革命传说

1950年代之后,苏维埃革命时期到内战期间的,有关中共领导人、民众英勇斗争的革命故事开始被大量公开发表。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这些故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某种史实或传承为基础的改编,另一种是来源于作家的创作。有不少故事出现的时间无法上溯到民国时期,因此无法否认的一点是,部分或很多传承故事本身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现的。此外,传承和创作之间的界限也难以界定。故事中间能够发现有关诸如领导人·红军以及有关他们的事物所引发的“革命传说”,其中部分传说跟1950年代发生的迷信活动甚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故事的流传,是民众在民间信仰的框架之内承认党和政府的权威的,同时也是权力将民间信仰融入自我权威建立的过程。但是,以无神论为

---

31 李若建前引书,第151-153页。

基础的有关中共的革命传说在公开发行的资料上没有得到充分验证,因此,在此仅是将到 1980 年代为止的具有上述特征的革命传说为研究对象,就权力在传说的创作与改造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意图进行讨论。

## 2. 干旱·求雨与毛泽东传说

与求雨或天气相关的革命传说目前发现较少,或许是由于上述农业集体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而导致与求雨相关活动的减少有关。1949 年发行的谭吐的《毛主席和关帝圣君》一文讲述的就是农民围绕关帝庙的修缮而引发的故事。故事中有人提议,“毛主席领导穷人闹革命叫穷人翻身了”,他“才是真正的圣人,咱们要修补庙宇以后就供毛主席”。同时对“关帝圣君最讲信义”的主张进行反驳,称“毛主席对人民最有信有义人”。也有人说,在关帝庙求雨也未能避免旱灾,但听了毛主席的话反倒就克服了坏年成。在各种激烈讨论之后由于没能达成统一意见,因此大家决定给毛泽东写信来对此事进行定夺。后来,送信的人回来后给大家带来的答案是:湖南农民运动之际,地主们对将集会所设在关帝庙的农民协会进行攻击,认为这是“欺神灭道”,对此,毛泽东带领农民来到关帝面前,责问关帝为何不帮农民。关帝无法回答,最终逃之夭夭了。自此之后,农民便不再信关帝而开始信农民协会<sup>32</sup>。

在这个故事中,关帝信仰被替换成了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成为了农民们的道德规范,是实现农民愿望的真圣人。同时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有关反对迷信的主张<sup>33</sup>也以面向农民的形式进行了改编。抗日战争末期到国共内战期间,在根据地神像替换成毛泽东像的民俗改造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但是,被毛泽东像所代替的神像多为掌管每个家庭幸福的灶神和财神,灶神在现实中被认为有像胥吏那样行为

---

32 同上,第 21 页。

33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一卷(第二版),东京:苍苍社,1983 年,第 133 页。

不端的现象。因此可以说,上述故事为保证毛泽东权威的正面化以及神格化,因而被选择替换的是在民间具有很大影响力且在传统认知中占有较高地位的关帝。

康濯的《毛主席万岁 关于井的传说》一文是一篇关于井的起源的故事,被收录在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有关毛泽东的综合故事集《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整理、工人出版社、1954年中)。故事以说故事的老人和听故事的“我”的形式展开。据说在以前,坏皇帝藏起了龙王的眼睛导致了旱灾的发生,民众来到龙王庙抬起龙王求雨但没有效果。此时,率领民众寻找龙王眼睛的一个大个子挖到水脉,从而水井诞生。老人在故事的最后点明,那个大个子就是毛主席。故事利用民间信仰的架构,不但展现了毛泽东具有为群众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领导力,同时也表明了民众对于毛泽东的信赖之情。此外,拜托老人口述而不是作者直接下笔,用贴近民众朴素信仰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神格化的毛泽东形象。

此外,魏晋的《手杖龙》<sup>34</sup>一文讲述的是,在洪湖(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送给一个老太太的拐杖治好了老太太的腰腿病的故事。听到拐杖传闻的清乡队前来夺杖,拐杖化为一条龙,将清乡队全部打落到湖里淹死了。有一年发生旱灾时,有条红龙升天降雨消灾。龙本是天子的象征,贺龙的拐杖化身为龙,间接地说明了贺龙本人就是受命于天的圣人。

### 3. 神药与革命

有关治病或神药的故事较为丰富,原本向一些与义人有关的事物求取神水神药的故事被替换成了与革命领导人或红军相关的事物而引发的奇迹。这样的故事是有关革命传说的典型模式之一。

《红军老祖的故事》由1934年在陕西省洵阳战死的一个红二十五军

---

34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革命传说故事》第一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所收。

游击队战士的事迹改编而成。1949年8月25日《陕南日报》刊登了名为《“红军老祖”的神话》的文章,10月6日《人民日报》以《民间传说“红军老祖”》为题进行了转载,文中介绍了位于洵阳县与郧西县交界处的红军士兵坐像“红军老祖”和安置坐像的庙、墓地以及与其有关的信仰传说。

据文章介绍,红军显灵给了生病的一家人一些药,这家人便药到病除了。从此有关于“红军显圣”的传闻便开始流传开来,一些没有医疗条件的民众开始前来收集坟前的香灰或墓地上的野草,将其奉为“仙丹”。“今天这一带地方的人民已被解放,人民虔诚等待的救星真的出现在人民面前”,以此强调民众的真正“救星”是中国共产党。当然,文章还同时指出,有必要将民众从迷信思想中拯救出来。《人民日报》几乎是原原本本转载了《陕南日报》的内容,但是为了突出反对迷信的立场,通过将题目中的“神话”改为“传说”等形式,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

1952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老沉的《“红军老祖”的故事》一文,被重新改编的这篇文章是一篇以敬慕红军的人民大众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为主线而展开的革命传说故事。作者应该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过实地调查,文章不仅确定了红军墓的确切位置,并且还第一次提及了有关人员的姓名。

老沉的文章以坟墓所在地潘家河所发生的政治斗争为中心内容。在为民众无偿治病的高医生战死,红军突围后,民众自发为其守墓,并编造“红军老祖”的神话故事来进行革命宣传,对前来求药者进行革命宣传启蒙,并组织了“红军老祖香火会”。反动乡长们对民众的信仰进行了镇压,在抗日战争期间,附近农村均被卷入其中,民众开始进行革命斗争。庙被破坏但斗争不止,终于在1947年到1948年之间,中共游击队到达,斗争迎来胜利。

1949年的文章主要描写的是农民向“红军老祖”求医问药的故事,而1952年的文章主题则变为了民众对于高医生的崇高的革命敬意,描

写的是觉醒的农民利用迷信大搞革命斗争的故事。权力对迷信的压制与农民根深蒂固的信仰原本是一对矛盾,这一点不论是在内战期间的根据地还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农村都是实际存在的。而上述 1952 年文章所描绘的是,对革命进行镇压的反动派与对红军进行坚决支持的农民之间的对立,以及两者进行阶级斗争的故事。

近年来通过当地对于“红军老祖”信仰形成的过程所进行的考证得知,曾帮忙安葬红军烈士的农民曹有伸后来一直为烈士守墓培土,将自己的儿子改名为“红孩儿”,将烈士奉为“红爷爷”并像对待自己祖先那样进行祭拜,自此“红军老祖”的传说便开始出现。数年后,有个名叫林振荣的人因为向“红军老祖”祈愿而治好了脚肿病,此人于 1946 年以“红军老祖会”的名义进行募捐,重建红军墓并刻碑纪念,自此之后“红军显应”的传说便开始流传开来。林振荣此人生平不详,但是,能够有能力发起庙会的人,应该不是中共所大力依仗的区区一介贫雇农<sup>35</sup>。

总之,“红军老祖”信仰原本是一个对于红军医生抱有强烈崇敬之情的农民的自发行为,但是“红军老祖”信仰的扩大却是像上述义人显灵那样,明显地体现了求取神药这一传统的民间信仰原理。有时,权力会在神水神药骚乱中与民间信仰产生紧张关系,因此,权力认识到有必要将“红军老祖”信仰改编成阶级斗争的故事从而将其进行无害化处理。

1981 年初,章广忠收集的《罗家祠堂》就是一篇将神药骚动为直接题材而描写的革命传说故事。在江西省南城县磁圭村罗氏祠堂的大门上有一个“打倒土豪劣绅 红军万岁”的标语,是红军时代曾在此驻留过的彭德怀所书写的。有传言称,有个老人因为触摸了这个标语之后病就好了,后来传言越传越广,又出现了民众将门柱子取下一块磨粉饮用之后能治百病的传言。当地土豪多次命令手下进行抹消,字迹仍然会浮现

---

35 陈世斌、王登霞《红军精神 永放光芒》旬阳县文广局,2015 年, <http://wenguang.xunyang.com.cn/Item/148692.aspx>, 2016 年 7 月 27 日浏览。

出来,于是便命人用斧头砍掉了标语。夜晚,民众又偷偷聚集到了祠堂,发现文字闪闪发光又浮现了出来,民众于是继续挖取门柱子为药<sup>36</sup>。不论是内战期间还是现代,要对迷信进行强行压制的权力与要将各种迷信复活的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体现在各种神水神药骚动之中。为缓和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有必要将民众描写成为反抗反动权力、支持革命、仰慕中共领导人的形象。

磁圭村的房屋上至今仍大量留存着 1930 年代红军书写的巨大标语<sup>37</sup>,这能成为有关革命故事的原型是可以理解的。假设成为这个故事原型所需要的传承或史实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故事的出现,是在当时的 1930 年代?还是共和国成立后彭德怀被打倒的 1958 年之后?抑或是名誉恢复的 1978 年之后?暂时未得而知。共和国成立后,民众向红军的“圣迹”求取神药的行为也有可能发生过。如果确实发生过的话,对农业集体化抱有不安和不满情绪的民众,向因批判集体化而被打倒的有关彭德怀的“圣迹”寻求安心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总之,神水神药骚动在共和国成立后仍然多次发生,这对该故事的成立与改编产生了巨大影响。

故事内容还说明,想要抹除革命标语的权力与对革命进行广泛支持的民众之间的对立,是革命故事以及传说的另一个典型特点。革命故事的设定是有其固定模式的,即:要有必将取得胜利的革命势力、必然涌出来的民众的支持以及必将败北的“反动势力”。“反动派”所面对的不稳定的政治形势以及民心的动摇这一故事构造,是共产党自身在与国民党、日军、各种会道门势力等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所亲身经历过的。

---

36 桦木、董森、杨惠临编《神枪镇恶魔 革命传说故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37-40页。

37 黄初晨《南城磁圭村:深山里的废都》《抚州新闻》,2008年,  
<http://www.zgfznews.com/epaper/newcity/6b/2008/3/14/55487.shtml>,2016年8月7日浏览。

## 结 语

通过激进的政治运动急速进行社会改革之时,中共政权对迷信所采取的压制措施招致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在民间,民众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政府权威将迷信行为正当化的事例屡见不鲜。求雨、求取神水神药这些民众自发的行为并非全都是反政府的,接受了中共的阶级教育,对“权利意识”已经开始有所认识的民众希望政府能够行使自己的“天职”,改掉对信仰的不信之心,敬天畏神,广施恩德于天下。从此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民间信仰极不稳定又充满变数,权力如果应对得当,是可以将民间信仰引入自我体制之内并为我所用的。

政权已经意识到了民间信仰对于权力的这种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由革命领袖、红军以及与其相关的事物所引发的奇迹而编成的“革命传说”。从而,现实生活中敬天畏神的民众与对信仰进行压制的权力之间的斗争关系,被改编置换,变成了民众对引发奇迹的革命正义进行支持,对反动权力进行抗争的革命斗争故事。民众的群体行为在危机(灾害、疫病、战争等)来临之际展现了其强大的凝聚力。民众在平时看起来如同一团散沙,但和民间信仰一样,也是灵活异常。意在构建战时体制的权力想要把民众改造成为在平时可以随时动员的力量。这个改造过程同时也是,与民间信仰如影随形的权力,在新的历史阶段,想要独占意识形态规范的再建过程。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种状况认为是中国权力构造的沉疴痼疾。中国社会与权力保持了一致性与同形性,正因为如此,有时民众才会在为全体大众谋求幸福时对权力进行激烈批判,所以我们而应当更为关注的是,这种要为“万民”谋求更为彻底幸福的动态过程。下层民众通过已经迸发的“主权者意识”,开始在全国各地要求信仰自由。这种状况也只有中共权力之下才真正成为了现实。



## 民間信仰と「革命の伝説」 ——祈雨、変天、神水・神薬を巡る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の 民衆と権力——

要旨：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の農村では、土地改革の進展とともに社会経済の改造が急速に行われたが、現世の個別利害を多神教的な信仰に託す農民の思考・行動様式は継続しており、中共の政治運動を通じて権利意識を強めた民衆は、むしろ迷信行為を正当化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党と政府の厳しい迷信禁圧政策は、農業生産を安定させるための技術・環境の整備が遅れ、医療や社会保障の基盤が極めて脆弱な状態において、民衆の激しい反発を招いた。朝鮮戦争に際しては中国に細菌兵器が投下されたとの情報を端緒に、全国各地で山川、旧跡に神水、神薬を求める民衆の迷信活動が盛んとなった。ここには、当時の階級闘争の展開、戦時動員の負担が引き起こした不満や社会不安なども関係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

一方これらの騒動においては、個々の利害に基づく迷信行為を政府の権威によって正当化する行動も多くみられた。祈雨や神水・神薬によって命をつなごうとする民衆の自発的行動は、全てが反政府的なものではなく、中共の階級教育を受けて一定の「権利意識」に目覚めた人々は、政府が不信心を改めて、天や神を敬い、その恩徳を天下に及ぼすという「本来の務め」を要求していた。その意味で、動揺・転変極まりない様相を呈するこの時期の民間信仰も、権力の対応次第では体制内に取り込む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であり、革命の指導者、紅軍やそれに関わる事物が奇跡をもたらす「革命の伝説」は、このような民間信仰の権力への要求を意識しつつ、形成されてい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の過程は、民間信仰と表裏一体を成す権力によるイデオロギー独占構造の、新たな時代にお

ける再構築でもあった。ただし、権力と同じイデオロギーを保持する社会は、より徹底した「万民」の幸福を実現させようとする志向をもっており、下層の民衆が広域にわたって、むき出しの「主権者意識」によって信仰の自由を主張するという状況は、中共権力下においてこそ可能となったものであった。

### **Folk Beliefs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lklore”: People and Power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over Praying Rain, Change of Heaven, Holy Water, and Holy Medicine**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 carried out rapidly with the progress of land reform in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mentality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peasants who entrusted their temporal interests to polytheistic beliefs had continued. The people, who became more conscious of their rights through the political movement of the CCP, justified their superstition. The strict anti-superstition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d to strong public backlash, since th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required to stabiliz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d been delayed and the found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was extremely weak.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biological weapons had been dropped on China during the Korean War, people’s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visiting mountains, rivers, and ruins seeking holy water and holy medicine—became popular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dissatisfaction and social unrest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struggles at the time and the burden of war

mob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se uproars, there were many government actions to justify superstitions based on individual interests. The voluntary behavior of the people who attempted to save their lives by praying for rain and searching for holy water or holy medicine was not all anti-governmental. In addition, those who had awakened to certain “individual rights” after receiving class education from the CCP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change its impiety and fulfill “its primary duty” of honoring Heaven and God and extending their grace to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the folk beliefs of this period, which show an unstable appearance,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olitical order, depending 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power. The “revolutionary folklore,” in which the leaders of the revolution, the Red Army, and their people bring miracles, was form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was aware of such demands for power from folk beliefs. This process also represen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ra in the ideological monopoly structure by the power that represent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ogether with the folk beliefs. However, the society, which retained the same ideology as the power, intended to bring more happiness for “all people,” and the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lower class insisted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ver a wide area, with unconcealed insistence of “sovereignty.” Such a situation was only possible under the power of CCP.